

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简史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

金融研究室编印

1978年12月

浙江
2
史
卷

F822.2/1

一家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

——浙江兴业银行简史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从浙兴铁路银行到浙江兴业银行	
(1907~1911)	3
一 浙路公司和拒收运动	3
二 浙兴银行的诞生	5
三 早期的业务开拓	7
四 辛亥革命时勉渡金融恐慌难关	10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扩充	
(1912~1926)	13
一 权力集中与业务扩展	13
二 对民族工业的联系	15
三 对帝国主义银行和钱业的相互依存	18
四 对北洋军阀财政金融的支持	21
第三章 蒋介石新军阀上台后业务受阻	
(1927~1936)	25
一 大革命中压制职工运动	25

二	对国民党政权心存戒惧	27
三	在四大家族金融垄断下业务受限制	30
四	与民族工业的相互依存加深	32

第四章	敌伪掠夺下存放牧的萎缩 (1937~1945)	37
一	资金转移中的损失	37
二	敌伪的军事和经济的双重掠夺	39
三	太平洋战争后的业务变化	42
四	机构人事变迁和权力之争	44

第五章	在反动金融政策搜括下的挣扎 (1945~1949)	47
一	国民党“劫收”和“清查”政策的威胁	47
二	反人民内战金融政策的桎梏	49
三	正常业务无法经营	51
四	上层人物态度的变化	53

统计表

浙江兴业银行资产负债表 (1907~1951)	56
浙江兴业银行上海行借贷资本运用分析表 (1917~1951)	65

浙江兴业银行上海行各项放款分析表	
(1917~1951)	70
浙江兴业银行上海行工业放款分析表	
(1917~1951)	75
浙江兴业银行上海行金融性放款和投资分析表	
(1917~1951)	80
浙江兴业银行上海行个人放款分析表	
(1917~1951)	85
叶揆初传	89

浙江兴业银行（以下简称“浙兴银行”）创立于1907年，它在发展过程中，逐渐成为中国私人资本主义银行中资力较大的一家银行，与浙江第一（原名浙江实业）银行，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合称为“南三行”。清末，浙江省人民在与英美帝国主义争夺路权的斗争中，成立了浙江全省铁路公司。为了便利铁路股款的筹集和运用，浙江铁路公司决定在杭州设立了“浙江铁路兴业银行”。所以，在一定意义上说，“浙兴”银行是我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运动的产物，也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产物。

“浙兴”银行资本构成中，以产业资本占主要地位。它与早期大官绅盛宣怀掌握的中国通商银行以官绅为主、买办为辅的资本构成不同；与同期的仪成、四明两家商业储蓄银行以商业资本为主也不同；与后期由买办商人投资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和由军阀、大官绅投资的金城银行也有差别。

“浙兴”银行开始以经营一般存款与工商业放款及发行银行兑换券为主，兼营储蓄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由于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国内外贸易的兴旺，该行在1915年即筹备经营外汇业务，后来又发展了仓库业务和信托业务。那时一般私人资本主义银行是不经营外汇、信托、仓库业务的，也不发行银行兑换券的。故“浙兴”银行与其他私人资本主义银行比较，它经营的业务是比较全面的。

“浙兴”银行和一般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一样，一方面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绅资本主义的压迫，所以与它们有矛盾，它曾反对过清政府出卖路权，呼吁人民储蓄和劝募路股，它曾同情五卅运动并捐款支持工人罢工，它曾反对蒋介石新军阀的勒索款项，表现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绅资本主义的一面。但另一方面它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绅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又有较多的联系，如它经常对外国银行大量拆款，对钱庄有拆放及推行兑换券关系，对官绅资本主义银行有领券及存借往来等等，因此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反官绅的勇气。特别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浙兴”银行一度附和过

反革命，扼杀过银行职工运动。1935年蒋介石政府实行法币政策，“浙兴”银行被迫取消发行权，业务受到了打击。抗日战争时期，在敌伪军事、经济的掠夺下，通货膨胀，货币贬值，存放款业务日益萎缩。抗战胜利以后，首先受到国民党“清查”政策的影响，接着又被迫将拥有的外汇移存中央银行。它所吸收的存款量最低时只合黄金8200两，与抗战前夕合63万两相比，约为1.3%，资力损失98.7%，因此，“浙兴”银行上层人物对蒋介石政府是不满意的。解放战争时期，在我党的民族工商业政策和统战政策的感召下，浙兴银行上层人物公开支持学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运动，积极向进步方面靠拢，终于同上海人民一道迎接了解放。

第一章 从浙江铁路银行到浙江兴业银行

(1907~1911)

一、浙路公司和拒牧运动

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为了在中国争夺势力范围，迫使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开办铁路、矿山等丧权辱国的条约，企图瓜分中国。清政府为了要维持那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越来越多地出卖国家的主权，以便和帝国主义紧密地勾结起来共同压迫和剥削中国人民。

1898年，代表俄、法、比三国金融资本的比利时公司，以“借牧筑路”为名，获得了芦汉铁路多筑权。因涉及英帝在长江流域利益，英国公使乃函请清政府总理衙门同意承造五条铁路，并以最后通牒相威胁。总理衙门派督办铁路大臣盛宣怀和英商怡和洋行订立了五条铁路之一的苏杭甬铁路（苏州经杭州到宁波）草合同四条。

1905年，美商倍次一再活动提出要承办浙赣铁路。

在1900年义和团反帝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已经逐渐认识到帝国主义者攫取各种利权的危害性。于是，一场与帝国主义争夺路权、反对清政府出卖路权的斗争蓬勃掀起。浙江铁路公司就是在反帝爱国运动的热潮中，在浙江省各阶层人民的全力支持和热忱援助下成立起来的。

1905年7月，浙江绅商在上海斜桥洋务局开会，商讨自办全浙铁路，一致要求废除苏杭甬草合同，成立浙江全省铁路公司，公举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为总理，候补四品京堂刘锦藻为副总理。清政府迫于舆论，同意商办，并赏给汤寿潜四品卿衔，督办全省铁路。同时，清政府又责成盛宣怀对“前与英商订立苏杭甬草合同”“赶急磋商收回自办”。

然而，老奸巨滑的英帝国主义一再指责清政府“违反草合同”，催订正式合约，强制借牧150万英镑。尽管江浙两省当日学生首先起来反对，绅商纷纷请求废约拒牧，但在英帝国主义的压力下，清政府对外屈膝投降，对内压制人民，悍然发布上谕：“外交首重大义，订约权在朝廷”，为了要“外全邦交”，决心把路权卖给英国。于是

江浙两省人民与清政府围绕着“借牧”与“拒牧”展开了激烈的斗争。

1907年10月22日，浙路股东首先在杭州召开国民拒牧会，一致表示“牧本足，无待借；路已成，岂肯押，浙人除遵谕自办外，不知其他”一面分电各省请求设法援助，一面号召浙江各地开会拒牧。各地纷纷函电请求清政府收回成命。

和国民拒牧会同一天，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邹纲因听到清政府接受英国借牧，非常气愤，绝食抗议，呕血而死。不久，浙路副工程师汤绪也绝食殉路。一时，群情激愤。江浙两省学生界、妇女界、工商界掀起了“拒牧、认股”群众性的爱国运动。他们一致通电表示：“今外部欲强迫我借外债办路，无异欲绝我浙人之命！”“路之存亡，即浙之存亡，亦国之存亡”“宁死不借外债”等等。

英帝国主义者见中国人民群起反对，紧催外务部赶快签押。并横蛮地照会清政府说：“此项借牧万不能改。”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当时是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就玩弄了一个“部借部还”（即由邮传部借牧和还牧）的阴谋，电诱江浙两省铁路公司派代表到北京商议。一面通过那拉氏电令江浙督抚解散各地拒牧会，颁布报律、结社律和学堂禁律，一概不准干预朝政，一面又派兵南下“剿匪”，进行武力威胁。两省铁路公司起先坚持“遵旨商办，不借外债”的阮则，并曾一度拘销代表，中断谈判。但两省铁路公司的大股东在政治上都是立宪派，他们和清政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不愿也不可能和清政府决裂，终于妥协。

1908年3月6日，由外务部、邮传部根据袁世凯的“部借部还”方案，奏请把苏杭甬改名沪杭甬，并和中英公司（汇丰银行和怡和洋行合资设立，专揽中国铁路利权）签订借牧合同二十四牧，同时，将借牧150万英镑折合成白银1000万两，作为邮传部对两公司的存牧，迫令承领，订定存牧章程十四条。

轰轰烈烈的拒牧运动由于立宪派的妥协而失败了，但它的影响是很深远的。人民对帝国主义者阴谋和清政府的卖国政策，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反帝反清的思想渐渐深入人心。

三 浙兴银行的诞生

浙路公司于1906年10月召开第一次股东会，并决定附设铁路银行。在当时，银行还是一种新兴事业。

浙路公司为什么要附设铁路银行呢？因为大量股款的保管和运用是一个大问题。浙江省城杭州，那时候仅有日升昌、源丰润、义善源、大庆元、合盛元五家票号的分号以及若干钱庄，资力都不很充裕。浙路股款存放在票号、钱庄，虽有一些利息收入，但支付不能得心应手。当时汤寿潜说：“年来为了将股款存放钱庄，很受他们气”，故计划设立银行，“不特有益于公司，也可省掉与钱庄的口舌。”

1907年5月间，根据浙路董事会的决议，汤寿潜以“存放之责，重于泰山”，“路款关系公司命脉，存放稍未稳妥，路政商市两受推伤”为理由，呈请清政府邮传部、农工商部、度支部核准设立兴业银行，取“振兴实业”之意，在未批准前即于1907年5月27日先行营业。因系浙路公司附设，俗称浙江铁路兴业银行。

1907年10月间，浙路公司接到清政府准予设立银行的批文后，于10月13日召开了浙江兴业银行第一次股东会，会议决定银行与公司分设。理由是：一、根据商律，公司附设银行，股东的责任不明确，故大多数主张银行独立；二、公司与银行各有其特定的营业范围，为了避免在盈亏方面互相影响，也以独立为宜；三、除浙路认股外，吸收工商业的股份，以便利存放款业务的开展；四、浙路公司的总、协理对于浙路工作已很忙，没有精力兼顾银行业务。这次股东会选举孙问涛、蒋海筹、沈新三为董事，选举舒爱周、蒋孟蘋为查帐人，选举胡藻专为总司理，于10月15日（阴历九月九日）在杭州保佑坊正式营业，办事人员十七人。

浙江兴业银行的设立，一方面是浙路公司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当时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正在兴起的一个反映。

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已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就浙江省的工业发展来看，情况也正是这样。从1895年起至1907年即浙江兴业银行成立的那年止，杭州（包括浙江其他地区）开办的新式企业有27家，资本总额389万元，其中纺织工业

9家，资本333万元，占85.4%，面粉、烛皂、火柴、造纸、罐头等轻工业12家，资本51.5万元，占12.4%。

“生产过程的发展促使信用扩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544页），中国原有的旧式金融机构票号、钱庄已不能适应资本主义工商业日益发展的需要，新式资本主义银行的建立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当时，官办的大清银行虽已成立，但在浙江省还没有设分行，甚至连官钱局都还没有。因此，浙兴的设立就显得必要了。

浙兴的资本定为一百万元，分为一万股，每股一百元，分四期收足。它的资本来源，具有一定的特点：

第一，产业资本占主要地位。浙江铁路公司本身是产业资本，它对浙兴的投资占浙兴资本的44.53%（原定投资一半，后因认股的人很多，故浙路公司让出一部分）。

第二、商业资本占相当比重。根据浙兴创办时的股款分析，商人投资占28.94%，官吏占5.42%，文化教育界占1.62%，所以，商业资本占相当比重，这和大官们盛宣怀掌握的中国通商银行、卖办商人投资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军阀官们投资的金城银行有显著的不同。浙兴的商人投资，主要的有金融业、丝绸业、盐商，其他如酱园业、药材业、米粮业、古玩业、洋布业、五金业等行业，亦均有投资。

第三、股份分散，另星小户很多。浙兴的资本除浙路公司外，最大的为二百股，1户；二百股以下，十股以上的共72户，3510股，十股及十股以下的为521户，1837股。其中虽有少数股东将一户化成数户，但十股以下的竟达521户，一股二股者有297户，说明股份分散，另星小户很多，这些小户的股票，后来被大户所吞并，说明股份公司是资本集中的主要方法之一，也是大鱼吃小鱼的一种手段。

浙兴最初的掌权人物是胡藻专、蒋海筹和樊时勋。他们三人都是浙路公司的董事。胡藻专出身金融业，他父亲在汉口开设银号、当铺，在杭州办安定中学。胡在浙兴第一次股东会上，被选为第一任总司理，以后迭任董事。其弟胡经六是浙兴后期的常务董事。

蒋海筹出身丝绸商人，杭州蒋广昌绸庄主。他原先是个自产自销

的机户，因常年背着绸包到富商大户兜售，走熟了门路，就带收一些别的机户的产品，赚取中间利润，以后他索性自己停织，专门收货兜售，当起包买主来，逐渐成为丝绸巨商，浙兴筹造时，他主动出资垫交股款，是个实力派，他的儿子蒋抑卮曾在日本留学，因浙兴的开办才回国的，以后继其父历任浙兴董事，一直是浙兴主要的掌权人物之一。

樊时勋是浙江镇海巨商叶澄衷的总管家，叶澄衷以经营五金起家，以后经营各业，分布长江各埠，累积资产至800万两。樊在上海商界很有声望，交游广阔，和张謇、汤寿潜、袁海观、萨镇冰等官场中人物交谊很深。浙兴成立后，樊任上海分行总理。

从浙兴的资本来源和掌权人物的经济地位来看，它是一家比较典型的民族资本银行。这在它的业务经营中也有明显的反映。

三 早期的业务开拓

1907年，浙江兴业银行设立时，从全国来说，除清政府开办的大清银行，四川省的濬川源银行及大官行、大买办盛宣怀开设的中国通商银行以外，它是全国最早的资力较大的一家私人资本银行。

浙兴在其成立后的第二年，分别在汉口、上海设立分行。

汉口自1862年开放为商埠后，工商业很快有了发展。单在1900~1907年这七年中，汉口一地创办的新式企业就有十四家，资本总额805万元。著名的汉冶萍煤铁公司就设在汉口。当时汉口的金融情况，浙江邦的钱庄拥有一定的势力，银行除了中国通商银行分行外，其余就是外商银行。1908年5月20日浙兴在汉口设分行，原因之一、“盖为招徕路股起见”，汉口为九省通衢，工商业较集中，招徕路股，兴办银行，当然有此需要。原因之二、是计划投资汉阳铁厂，以解决浙路公司路轨的需要。浙兴董事蒋抑卮、郑岱生、沈新三等人在汉冶萍厂矿进行调查，由于银行当时资力不足，未投资，但浙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浙兴董事蒋抑卮、胡藻专、沈新三等都各自投资，成为汉冶萍煤铁公司的新股东。

1908年8月16日，浙兴上海分行开业，上海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即已取代广州而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中心，工商业有了较大的发

展。1863—1907年，已有122家新式企业创立，资本总额达2086万元。浙兴在上海设立分行，一是为了收存浙路股款，起先上海收到的股款，都委托钱业总董谢纶辉分存协升、慎丰、寿丰、兆丰等二十九家钱庄。设分行后，这部分股款就可自行收存。二是想通过上海这一通商口岸为浙路公司采办建筑铁路所需的五金、器械提供方便。另外，工商业的发展，对外贸易的需要，银行券的发行，开设银行是有利可图的。

浙兴开办以后，业务逐渐发展，它的主要业务是：

(一) 存款。分为定期、随时、储蓄、往来四种。1907年底，定期存款为15万余元，随时（即活期）存款8.7万元，储蓄存款5千余元，往来存款170余万元。合计197.2万元，至1910年底，上升为250.7万元，增长27.1%。在全部存款中，浙路公司的存款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浙兴第一届营业报告中说：“往来存款以浙路公司赶筑土方支款至四十余万元，未免顿觉减少”。又根据1908年董事会议事录记载：“公司股款九月底止揭存往来十二万余，新股三十万余，代招路股十八万余”。这样，公司的股款存在浙兴总行的即达六十万元，沪行汉行尚不在内。

此外，浙路公司又有一笔“部拨存款”存在浙兴，这就是以邮传部出面向中英公司借的150万英镑，邮传部再以此项借款的一部分拨给浙路公司，作为“部拨存款”，年息五厘。浙路公司为抵制英人借款，决定将此款存入浙兴，不动分毫，准备随时交还邮传部。当时浙兴董事会曾说“公司部款如何存放事”，他们因公司不会动用这笔存款，故决议：“所存本行部款，无须预备”。

三 发行银行券。浙江兴业于1907年5月开始营业后不久，立即向清政府度支部要求享有发行兑换券的权利。它在呈文中写道：“杭州地居省会，又已开为商埠，上海银行等钞票浸灌内地，日甚一日，禁之不及，听之不能，外币浩浩，赍续输入，动摇全市，吸脂吸膏……”。其中所讲的上海银行等，是指汇丰、正金等外商银行发行的钞票在杭州广泛流行。呈文还指出：杭州的票号、钱庄也发行银条、钱纸，并流通于市，发行银行券本是银行的一种重要业务，为了适应

浙路公司在铁路参筑方面和市场需要，故要求准予浙兴银行享有兑换券的发行权。7月18日得度支部批准，于是委托商务印书馆承印银行券，并呈报浙江省藩司发出告示，“晓谕通衢及通衢各府转饬所属，无论官商，一律通行”。银行券印有地名，分别在杭州、上海、汉口发行。发行数量，逐年都有增加，1907年为3.3万元，1908年为24.9万元，1909年为77.8万元，1910年为128.2万元。

浙兴银行券的发行，主要通过二个渠道，一是供浙路工程营造上的需要，公司支付工人工资时，搭发少量银行券。二是通过钱庄等代理发行，代理庄领用银行券可以开一个月的期票。

三 放牧。浙兴早期的资金运用，主要是定期放牧。1907年底定期放牧为245.3万元，占全部资产的97%，1910年底定期放牧为334.4万元，占全部资产总额的66%。定期放牧分仗用和押牧两种，“仗用放牧以殷实妥靠之钱业同行为多；押牧以绸丝油米为大宗，均具有妥保。”利率平均约七厘，期票贴现和押牧约八厘，掉息（同业拆放转期利率）约五厘。

为了积极开展业务，浙兴在发行银行券时，散发了大量宣传品。据英商《北华捷报》报导：“自从反对浙路借款运动发生以后，随之而来的有一种新形式的文艺作品，往往一印数千份，在全市散发。最近发现的这种印刷品，大抵关于新组织的浙江兴业银行，劝告人民大众以余资存储该行或购买铁路股票。凡各阶级都要求用少看几次戏、少买几本书、少坐几次车以及其他节约办法，从事储蓄”。这家报纸站在帝国主义的立场上指责宣传品中“呼吁保全国家主权”是“煽动性的”，指责宣传品“以利欲动人”。但是，这家报纸也不得不承认“银行业务似乎很发达，灿烂的崭新的一元券已在杭州自由流通……印刷相当精美……当然是一大进步。”

由于浙兴是浙江省当时唯一的一家银行，在全国也是最早的商业银行之一，其业务活动当然引起帝国主义分子的瞩目。同时，在杭州的金融界中，由于浙兴与杭州最大的企业浙路公司的密切关系，由于浙兴有大量资金存放于钱庄，因而很自然地居于重要地位。这可以从下面两个事例中反映出来：

1907年10月起，上海洋厘逐渐上涨。（洋厘是银元用银两表示的价格，当时银两和银元并用，在正常情况下，洋厘为7.25—7.3钱，即一枚银元折合白银7.25—7.3钱，但由于钱庄资本家和投机商人的投机操纵，洋厘曾被哄抬到8钱以上，1911年到过8.32钱。）浙江省各埠的银元纷纷流往上海，杭州现洋来源少，银根紧缩，各钱庄都缺乏头寸，引起恐慌。各钱庄、商号商议向省政府借公牧30万元，以资周转，解决困难，就公推浙兴出面承领并分借给各钱庄、商号。

1910年四五月间，杭州金融又起恐慌，钱庄相继倒闭不少。这时正是新茧上市季节，丝绸商人因银根奇紧，现洋既枯，拆息又大，迟迟不能开秤收购，于是又由浙兴出面向政府转贷，接济钱庄和丝绸业。

然而，总的来说，浙兴从开办起到1910年这三年多中，存款只上升27.1%，放款只增长36.8%，银行券发行不过128万元，应该说业务的发展是比较缓慢的，这与这一时期政治经济的激烈动荡有关。辛亥革命前夕，人民群众反帝反清的斗争汹涌澎湃，清朝统治摇摇欲坠，又因甲午战争、八国联军的巨额赔款，清政府财政赤字累累，政治危机和经济危机交织在一起。金融业也面临巨大威胁。1908年，汉口怡和兴、怡和利、怡生和三大钱庄倒闭，引起市面动摇。继而，1910年7月，上海发生了“橡皮风潮”，正元、渣余、兆康三家钱庄因受牵累而停业，随之而歇业，清理、破产的钱庄接踵而来。延及9月，有名的源丰润票号，因各埠风潮迭起，无法应付提存，宣告清理，它的分号遍及各省市及主要商埠，所以影响很大。浙兴由于业务经营上比较稳健，得以保存，但在这样的形势下，业务自难有大幅度的增长。

四、辛亥革命时，勉渡金融恐慌难关

1911年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走狗清朝的统治，摧毁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这是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时期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革命运动。当革命爆发时，浙兴在业务上受到了一次大的冲击，

10月10日，武昌起义，11日、12日革命军相继占领武昌、汉阳、汉口。清军猛烈反扑，战斗激烈。市民纷纷向银行提存和兑现，12日夜汉口、汉阳发生大火，秩序纷乱，至13日，银钱业均停止营业。浙兴汉口分行也暂告停业。

消息传至杭州，市面上讹言“汉口兴业银行倒闭”，顿时引起恐慌，兑现、提存者蜂涌而至。浙兴杭州总行发行银行券60万元，活期存款50万元，各种应付票据30万元，而库存现金只有30万元。于是由上海分行急运十万元现洋至杭，同时对存放同业的五十万元，悉数贴水收回。但不足之数仍达50万元，浙兴上层人物四出奔走，向大清银行杭州分行和两浙盐运使署借到3.5万元，应付提存。又因各种应付票据大半是浙路公司的材料款，可以暂缓支付。至十月二十七日，银行券和活期存款大部兑尽，风潮始告平息。

上海当时受汉口影响，金融情况也非常紧迫。各银行、钱庄的存户，纷纷提存。外国银行因市面不稳，遂将拆票逐渐收回。于是银拆陡涨至7钱以外。而各银行为接济汉和关系，连日运出现洋六七十万，故洋厘亦涨至7钱8分。当时，因之而倒闭的有承大、升大、志大、瑞大、余大、衍庆、大庆、晋和、敦和、慎德等钱庄。

浙兴上海分行因汉口的商民来沪避难，大多携带浙兴汉钞，到沪兑现。加上上海分行本身已在应付风潮，所以更加感到吃紧。银行营业厅及大门口，前来提存、兑现的人群拥挤不堪。当时浙兴上海分行发行银行券约60万元，活期存款约30万元，各种应付票据10万元，可用于支付的只有库存现金20万元和存放同业存款30万元，又要代汉口分行兑现约15万元，不敷竟达65万元之巨，形势十分危急。

这时，浙兴上海分行总理樊时勋曾电大清银行监督叶揆初求援。叶揆初和浙兴早有渊源，但辛亥革命使大清银行本身亦陷入困境，叶自顾不暇，复电表示“无能为力”，并说“有同归于尽之势。”于是浙兴在沪董事及上层人物，到处张罗，“象鹿渴求清水一样”筹集现金。马克思说：“利息率在危机期间达到最高水平，因为这时人们不得不以任何代价借钱来应付支付的需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25卷第404页)浙兴不得不以本票在市场上高利贴现,以应付挤兑,最高时一千元的本票,只能贴现九百元。

正当浙兴上海分行处于应付挤兑、提存的危急之际,11月4日杭州新军起义,推举浙路公司总理汤寿潜出任浙江军政府都督。浙兴向汤求援,汤因江浙革命联军要出兵攻打南京,需用银元发放军饷,就把浙江省藩库、运库、粮库的现银运至上海,委托浙兴上海分行兑换银元络续支用,当大批银子一箱一箱运到浙江兴业上海分行营业处大门口时,挤兑的人群看到现银源源不断地运来,以为准备充沛,挤兑的风潮才慢慢平息下去。

这次风潮,几乎把浙兴的全部现金库存提取一空,到1911年终,浙兴的现金库存下降为14.1万元,仅为1910年底的十分之一。

1911年10月浙兴挤兑时,杭州总商会为维持市面起见,曾商请运库拨借库平银十万两,并由大淩银行杭州分行先后借收二十余万元,支持浙兴渡过难关。杭州光复后,军政府以军需急用,向浙兴催还此项借收,浙兴筹还了一下分,尚欠十五万两,要求展期归还。后来,又以“市况萧条”、“前淩官收,免于追逼”为由,要求将旧欠十五万两“概从豁免”。至1912年5月,浙江财政司批示:“来帖率请豁免,殊堪诧异,公家待收甚亟,应即遵限,如数措缴。”浙兴心有未甘,又通过当时任浙省都督汤寿潜的关系,要求豁免。汤寿潜提了一个“再行展期,分期淩缴”的通融办法,财政司不同意,浙兴又提出以有价证券作价抵偿的要求。最后,在汤寿潜的督促下,财政司同意分期缴收,于七年内还淩,利息概予免去,等于使浙兴获得了一笔十五万两的长期无息存款。这一事例,反映了浙兴资本家“落水叫救命,上岸要包果雨伞”的丑态。1911年虽然金融动荡,浙兴因代兑银元关系仍获得6.7万元的纯益,高于开办初期的1907—1909年。

在1911年的金融风潮中,商业银行如“仪成”“大通”先后倒闭,票号几乎全部被没,钱庄大多歇业,而浙兴却因浙江铁路公司的关系和汤寿潜的支持,度过了难关,站住了脚根,为今后业务开展树立了一定的根基。

第二章 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的扩展

(1912~1926)

一、权力集中与业务扩展

浙兴最早的掌权人物是胡藻专和蒋抑卮，辛亥革命后，叶揆初和蒋抑卮合作，在浙兴掌权达三十年之久。

叶揆初是杭州人，是清末大官丁赵尔巽的干女婿，科举出身。赵尔巽任奉天盛京将军期间，叶任总文案，兼会办财政局事，与同僚金仍珠，同为赵尔巽的左右手，人称“金珠玉叶”。1905年浙路招股时，汤寿潜经樊时勋介绍，委托叶在东三省招募股款，得11万余元，浙兴招股时，叶投资五千元。所以，叶揆初和浙路、浙兴早有渊源。

1907年，江浙资本家组织了一个调查团到汉口，准备投资汉冶萍公司。叶揆初恰巧也在汉口，经他的好友、汉冶萍公司经理李一琴介绍，认识了团员中的蒋抑卮、胡藻专、沈新三、蒋孟蒹、周湘舫、张潜如等人，这些人都是浙路和浙兴的董事。

不久，赵尔巽调四川总督，派叶为四川驻沪转运局总办。叶和浙兴上层人物往来密切，朝夕相见，无所不谈。经胡藻专推荐，叶一度担任浙兴汉口分行总理。（挂名遥领，实际工作由汉行内总理项兰生主持）。

1911年春，清政府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财政紊乱，叶被派任造币厂监督，不久又派任大清银行监督，于是辞去浙兴汉行总理职务。

辛亥革命时，大清银行宣告停兑，以后清理改组为中国银行。叶揆初因“维持无力，咎无可辞”，当然也做不下去了，就辞职回上海。1912年当选为浙兴董事。这时，浙兴沪行的实权掌握在樊时勋手中，杭州总行由沈新三任总理，汉行由盛竹书任总理，权力比较分散。

1914年，浙路公司收归“国有”。浙路公司大股东蒋抑卮推叶揆初为浙路清标处主任。浙路投资浙兴的股份，大都为蒋抑卮所收买。于是浙兴董事会的权力，逐渐集中在蒋抑卮、叶揆初手中，然而，当时的浙兴，事权并不统一。董事中，有杭董、沪董、汉董之别，沪杭